

出版知识丛书

实用编辑学

主编 阙道隆

出版知识丛书

实用编辑学

主编 阙道隆

中国书籍出版社

《出版知识丛书》

实用编辑学

阙道隆主编



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城区前赵家楼胡同 1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11.75 印张

280 千字 1986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1986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1——10000 册

统一书号 7491 · 001 定价 2.80 元

《出版知识丛书》

总 序

我国社会主义出版事业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也是物质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和重要条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曾经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把出版工作推到我党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为了适应两个文明建设的需要,党中央和国务院认为,必须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使出版事业有一个更大的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出版事业发展很快,成绩显著。

与此同时,我国出版科研事业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中央《决定》明确提出:“要建立出版发行研究所”,加强出版、发行的“科研工作”。根据这个精神,三年多来,我国出版界在出版科学研究方面作了许多工作。首先,我们建立了中国出版发行科学研究所,在好几个省市成立了诸如研究室、学会、研究会等这样一类组织和机构。在十多个高等学校开设了图书编辑专业和图书发行专业,兴办了更多的中等专业学校。创办了六、七个学术性或学术资料性刊物,召开了全国性和地方性的出版科学学术讨论会和研究会,先后交流了几百篇论文和学术性资料。出版科学方面的专著、译作、教材和教材性参考读物,也正在著述、编撰中。《出版知识丛书》的出版,正是出版科研战线上许多新生事物中的一项。尽管我们在出

版科研方面起步比较晚,三年多的时间不算长。但是出版科研事业的发展速度令人鼓舞,相信今后的形势将会越来越好。

我们编辑出版《出版知识丛书》的目的有两个:一是为了展示和积累出版科研的成果,加强学术交流,进一步推动出版科研工作的向前发展;二是提供理论性知识性读物,为加强和改善出版教育、培养出版人材、加强中青年干部的业务培训,提高出版队伍的素质服务。从根本上说,是要通过《出版知识丛书》的出版,不断总结我们在出版工作中长期积累起来的实践经验(历史的和现实的经验),使它理论化和系统化,赋予现代科学的形态,从而建立起我国出版科学的理论体系,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出版学,为繁荣和发展我国的出版事业,为我国出版事业的现代化和科学化,为出版事业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适应两个文明建设的需要服务。

编辑出版《出版知识丛书》是一件新事,是一种尝试,困难和问题一定不少。但是,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我们愿和广大的出版工作者一起,和出版界内外热心出版科研事业的同志们一起,共同努力。

中国书籍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十月八日

前 言

1983年以来，我国出版界加强了自身的理论建设，并正式提出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出版学、编辑学、发行学的任务。出版界研究风气的兴起，并不是偶然的。我国的出版事业源远流长，有丰富的经验值得总结。我国的社会主义出版事业是新型的出版事业，有许多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需要研究。实践的要求呼唤理论的产生，而创造理论的任务，理所当然地落到了出版工作者的肩上。一种紧迫感和责任感促使大家行动起来，在出版科学的园地里耕耘开拓。三次出版科学的论文交流会相继召开了，几个专业刊物也应运而生。这本《实用编辑学》就是在这种形势的推动下诞生的。

1984年夏天，我动了编一本编辑学的念头，于是找一些同志商量，他们也积极赞成。进一步酝酿方案的时候，我们也曾犹豫过。因为编辑学尚在孕育的过程中，我们的学识和经验有限，又有繁重的工作任务，从事这种开拓性的工作，难度太大了。经过多次研究之后，决定从我们现有的条件出发，提出比较实际的奋斗目标，确定比较恰当的编写要求和编写方法：

一、我们不奢望一下子就构造出编辑学的严密理论体系，只力求对实际工作中的经验体会作出初步的整理和概括。这样写出来的书，即使系统性和理论深度不够，仍然不失实用的价值。

二、多请一些同志参加写作，先议定一个框架，然后分头执笔，独立完成任务。采用这种方法，能够较快地拿出一个本子来，在编辑学著作较少的情况下可以应急承乏，或许还能与其他同志建筑编辑学的辉煌宫殿奉献几片砖瓦。

方案确定之后，大家开始分头写作。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主要原因是大家太忙，写作进度很不一致。从开始动笔到把稿子收齐，再退修定稿，差不多花了一年半的时间。现在总算全部定稿了，可以付印成书，接受读者的审查。

以上是成书的经过。下面再谈谈我们设计这本书时的一些想法。这是一本多人的文章合集，各个章节充分反映了每位作者的观点和个性。同时，这本书又有统一构思，这种构思反映了我们（或多数作者）对编辑学的一些共同看法：

编辑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需要研究解决编辑实践中提出的问题，例如，编辑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指导方针；编辑过程中各项工作的原理和方法，编辑人员的素质和培养途径，以及编者和作者、读者的关系，等等。如果脱离编辑工作的实际进行学院式的研究，编辑学就丧失了生长的土壤和活力。

另外，编辑学又不能孤立地就事论事地研究实际问题，还要探讨编辑工作的内在规律，对实际经验进行理论概括，建立起自己的理论体系，否则，也就没有编辑学了。因此，编辑学需要探讨下列基本的理论课题：编辑劳动的性质和功能，编辑劳动产品（读物）的特点和作用，编辑活动同印刷发行以及社会的经济、政治、科学文化诸因素的相互联系，等等。只有正确地解决了这些问题，才能认识和掌握编辑工作的规律。

一方面要研究实际问题，另一方面又要研究理论问题。这两方面的工作互相促进，相辅相成，不可偏废。

编辑工作的要求因读物类别不同而发生变化。为了把编辑

学的研究领域充分展开，我们不仅要研究编辑工作的一般规律，还要探讨各类读物编辑工作的特殊规律。这方面的工作做好了，我们对编辑工作就会有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同时会衍生出编辑学的各门分支学科（如科技读物编辑学、翻译读物编辑学、古籍编辑学、辞书编辑学等等），扩大编辑学的应用范围。

本书绪论部分，对编辑学理论方面的问题提出了一些不成熟的看法，然后按照这种看法安排全书结构，依次谈了编辑过程，编者、作者、读者的关系，几类读物的编辑原理和方法。在全书中，从应用角度写的章节占了大部分篇幅，所以我们把这本书定名为实用编辑学。

如果这本书还有存在的价值，那完全是各位作者努力的结果；而在总体构思方面存在的疏漏和缺陷，则应该由我负责。我们期待着读者的指教，更希望有比较成熟、比较完善的编辑学著作取代它。

阙道隆

1986年6月

目 录

前 言

绪 论

第一章	图书.....	1
第二章	出版事业.....	17
第三章	编辑工作.....	37

编辑工作过程

第四章	调查研究和信息.....	54
第五章	选题·组稿.....	68
第六章	审稿·加工·发排.....	78
第七章	装帧设计.....	95
第八章	校对.....	112
第九章	书籍宣传.....	134

编者·作者·读者

第十章	作者工作.....	147
第十一章	读者工作.....	161
第十二章	编辑修养（上）.....	178

第十三章 编辑修养（下）	190
--------------------	-----

几类读物的编辑工作

第十四章 政治理论读物	202
第十五章 青年修养读物	217
第十六章 人物传记	235
第十七章 史地读物	251
第十八章 古典文学读物	267
第十九章 科普读物	285
第二十章 少年儿童读物	299
第二十一章 辞书	314
第二十二章 翻译读物	339
第二十三章 青年刊物	357

结束语

绪论

第一章 图书

一 中国书的起源和发展

中国书始于何时？要研究这个问题，必须考察中国文字的形成和发展；因为只有把许多文字根据一定意识有组织地排列起来，才能成书。

文字是各民族在发展过程中历史地形成的。以汉字为例，它的形成和发展，有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靠一篇文章是连其大概也无法说明的，这里只能围绕文字和书的关系作些简述。

我们知道，语言是人类在劳动中产生的，可以用来直接交流思想。语言的产生是人类发展的一个很大进步。但语言的局限性在于：如果超越了声波到达的范围和声音完结的时间，就会失去交流思想的作用。为此，必须依靠记忆，把语言用某种形式记录下来，送往远方，传给后来者。所以，我们的原始先民有结绳记事的办法。但这种办法很难表达复杂的事物。于是，我们的祖先又开始用画图来记事和达意。

开始的图画和记号，也就是后来我们称之为文字的符号，最早也许是画在地上、树上和石上；后来可能是为了便于携带和易于雕刻，把龟的腹甲、牛羊猪及其它野兽的肩骨，甚至人

的头骨，都被用来作为刻字的材料。这些刻在甲骨上的文字，统称为甲骨文。甲骨文是1800年在河南省安阳县小屯村发现的。据考证，小屯村是三千年以前殷王朝首都的遗址，所以被称作“殷墟”。这里出土的甲骨文叫“殷墟甲骨”，数量已达十六万片以上。其中刻字最多的一片有九十三个字，这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我国最古老的长篇原著。从这个意义上说，甲骨文是我国历史上最原始的书的雏形，算来距今已有三千五百多年了。

“殷墟甲骨”使我们看到了商代的文字。但商代不仅在甲骨上刻划文字，也已开始在青铜器上铸字或刻字，人们称后者为“金文”。从现在出土的文物看，商代青铜器上铭文的字数很少。到西周成王时，一件“金彝”上的铭文，已有一百八十七个字，西周康王时的“大盂鼎”铭文，有二百九十一个字。字数更多的“金文”作品，当推西周末年宣王时期（公元前827年起）的“毛公鼎”铭文，一共有四百九十七个字。这当然是稍后的事情了。

用竹片、木片作为书写文字的材料，是我国古代广泛运用的一种形式，称为竹简木简和木牍。把许多简编串在一起，谓之“策”或“册”。《尚书·周书·多士》称：“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可见殷商时期已经有了简策书籍了。我国很早就发明了养蚕，因此丝织品也很早被用作书写材料，当时称这种丝织品为“缣帛”。《韩非子》中说：“先王寄理于竹帛”。《墨子》中称：“书之竹帛，传之后世子孙”。可见周代的书写材料不仅有竹，也已经开始用帛了。许慎在《说文》中曾经说过，“著于竹帛，谓之书”。如果以书写在竹简、缣帛上专供人阅读的著作物，作为我国成册书籍的起源的话，那么，我国的书，起码也有三千二百多年的历史了。但简牍笨重，缣帛

昂贵，影响了早期书籍的广泛流传。书写材料纸的发明和书写工具笔墨的发展，使书的形式开始从简策向手写纸本逐步转变，开创了我国图书史上新的一页。旧说东汉蔡伦造纸，秦代蒙恬制笔，西周邢夷作墨。根据新的考古发现，他们都不是纸、笔、墨的最早发明者。1933年在新疆罗布淖尔出土的西汉麻纸，是公元一世纪所造，比一些史书说的蔡伦于公元105年造纸要早一百年左右。目前尚有争论的所谓灋桥纸，是1957年在西安灋桥出土的，据认为是公元前一世纪制作的，如此说成立，则比罗布淖尔出土的麻纸，也要早一个世纪。由此可见，造纸并不是始于东汉蔡伦，而是始于西汉。不过西汉纸的质地粗糙，尚不宜于用作书写材料。到了东汉，蔡伦作为尚方令主管宫廷的手工作坊，在前人造纸经验的基础上，改进了造纸技术，提高了纸的质量，制成“蔡侯纸”，使之适宜于书写。这是蔡伦对造纸工业作出的贡献，也是不容抹煞的。

纸的产生，对中国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从此手写纸本书就逐渐流传开来，克服了简策和木牍笨重和不便携带的缺点，也避免了缣帛的昂贵和难于普及的弱点。由于纸张书写方便、携带简便、价格低廉，过去一般读书人不敢问津的帛书，现在可以用纸书来代替，从而使知识得以普及。所以纸书的出现，是世界文化史、图书史上的一大进步。

手写纸书对竹简、木牍和缣帛来说，固然是一大进步，但从它本身来说，又有很大的局限性。一个人抄一本书，往往要很长时间，几天、几个月，甚至几年。我国历史上有的人科举不第，当一个专门抄书的小吏，一辈子埋头抄书，往往也抄不了几部书。即便经过长时间的奋斗，就算抄成了，也只有一本，能够读到的人很有限；而且写本经过辗转传抄，容易出错。这不仅限制了读者的数量，而且影响了书籍的质量。

在这种情况下，适应当时生产发展水平和社会需要的雕板印刷术出现了。雕板印刷是在印章、石刻和拓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印章和石刻在我国历史上很早就有了。只是印章上的字数较少，大都刻在玉器和石头上；石刻是由印章发展来的，每件上的字数比较多。现在能够见到的最早石刻，要算春秋时代秦国的石鼓文。此石刻大约刻于秦襄公八年，即公元前771年。此后石刻逐渐发展。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春，开始把《易》、《诗》、《仪礼》、《春秋》、《公羊传》、和《论语》七部儒家经典著作，镌刻在石碑上，共四十六块，立于太学门前，名谓“熹平石经”，供读书人抄写、对照，实际上成了儒家经典的标准文本。

此后，历代虽然也有仿效“熹平石经”的续刻，如曹魏“正始石经”、唐“开成石经”、宋“嘉祐石经”、清“乾隆石经”等，但许多人围在几块石碑前抄写，毕竟不大方便。于是，有人发明了用石碑墨拓的方法录取碑文，这样既迅速又避免了抄写的错误。碑拓方法的出现，成为中国纸书印刷的源头。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才发明了雕板印刷术。从此，中国书开始由手写纸本逐渐向刊印本转变。雕板印刷术的发明，大大加快了书籍生产的数量，促进了文化技术的传播和交流，是我国文化史、图书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是我国图书印刷史的开端。

雕板印刷始于何时？学界对此一向众说纷纭，大致有：东汉说，晋代说，六朝说，隋代说，唐代说，五代说，北宋说。即使是认定开始于同一个朝代的人中，也还有时间先后的不同说法。古今中外的学者在这方面都已经作过许多探讨。现在看来，大多数的意见，或者说论证比较充分而有说服力的意见，是隋代说和唐初说。唐朝已有雕板印刷，这一点是有充分根据

的。

这里姑且不说公元六百余年李世民传旨“梓行”长孙皇后的《女则》一节，至少公元七百余年《开元杂报》和咸通九年（公元八六八年）王玠刻印的《金刚经》都是有实物可据的。

如果说，发明雕板的时间，学界争论不休，各持一说，那末，活字印刷的起源，看法就比较一致。这应该归功于与活字印刷术发明者毕升同时代的沈括。沈括（公元1031—1095年）在《梦溪笔谈》中曾明确记载：“〔北宋〕庆历中（公元1041—1048年）有布衣毕升又为活板。”并且具体记述了胶泥活字的制作和印刷的方法。据此可知，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的时间不能晚于公元1048年。这样就比德国人谷登堡约在1450年前后发明铅活字排版印刷术要早四百年。而且毕升还试验过木活字印刷，只是没有成功。

前述谷登堡发明的铅活字印刷术的输入中国，是我国出版史上又一划时代的大事。1807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为了传教的需要，首先在澳门筹备中文铅字，1814年他派人在马六甲设立印刷所，1819年印出第一部中文圣经。1833年外国传教士在广州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应是在我国国土上出版的最早的铅印杂志。

鸦片战争后，我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社会政治斗争错综复杂；各党派、各阶层，各种关心国事的人，纷纷著书立说，开出种种“救世药方”，以宣传争取群众。书刊的大量出版促进了出版事业的发展。

1862年在北京成立的“同文馆”、1867年上海江南制造总局开设的翻译馆，先后成书几百种。稍后，又成立了“强学书局”和“译书院”。同时，私人译书和办出版事业也日益增

多，1897年建立的商务印书馆和1902年建立的文明书局，是当时中国人经办的较大的两家出版企业。到二十世纪初，仅上海一地已有新式出版企业四十多家，形成旧中国出版事业的中心。

我们党历来重视出版工作。

党成立以后，于1921年在上海成立了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书籍和其它革命书籍。1923年党又创办了上海书店，通过门市经售革命书刊，并向全国各大中城市的进步书店供应书刊，还在巴黎、香港设立特约经销处。上海书店曾发行过《向导》、《中国青年》、《新青年（季刊）》、《前锋》等党、团主办的刊物。此后，在历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党都坚持和发展出版事业，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全国胜利以后，党对出版工作的领导，进一步加强，1949年2月，党中央宣传部成立了出版委员会，与新中国诞生的同时，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也建立了。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出版事业得到了新的发展，写下了我国文化出版史上崭新的一页。

目前，我国已拥有：出版社四百多家，刊物四千多种，职工二万余人（不含相当数量的不属出版社编制的刊物工作人员）；书刊印刷厂一七七所，职工十三万有余；新华书店建有售书店一万多个，职工八万多人（不含合作社、集体企业的从业人员）。总起来整个出版战线上的从业人员总数已超二十四万人。一个门类比较齐全的出版系统已经基本形成。据1985年统计，共出版图书四万五千六百余种，印数达六十六亿五千多万册，总印张达二百八十一亿七千万印张，平均每天有一三零种图书出版。全国人均拥有量已达六本，居世界各国的

前列。

当代我国的图书出版事业，无论在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方面，在传播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方面，在丰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在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发展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方面，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积极作用。

二 图书的特点

我们日常接触到的图书，是根据社会的需要，以传贮为目的，通过一定的物质材料，用文字、图像、符号和声音按照一定的结构、体系，集中地记录某种思想、文化、科学技术，便于个人携带使用的非定期连续性出版物。具体说，图书是一种物质产品，但不是一般的物质产品，而是一种以传播和贮存思想文化科学知识为目的的物质产品，也就是说，是一种承载精神产品的物质产品。它传贮知识是依靠记录文字、图画等来实现的。这些字画又不是任意组织起来的，而是根据一定的思想体系来安排的；不是零散的、片断的，而是以相当集中地反映出某种社会意识形态为条件的。在具备上述各种要素以后，它还必须是便于个人携带的，从而区别于固定的石刻、壁画等作品。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图书具有以下的基本特点。

它既是精神产品，又是物质产品。但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反映图书本质特点的是精神产品，物质产品只不过是这种精神产品的承载工具，离开了精神产品就不成其为图书了。反之，没有一定的物质形式，精神产品失去了承载体，也不成其为图书。当然，具有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两重性的不仅仅是图